



百姓生活 记忆

上海故事

上海影像工作室◎著

学林出版社

百姓生活 记忆



上海影像工作室◎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生活记忆 / 上海影像工作室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486 - 0296 - 5

I. ①百… II. ①上…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上海市—1949~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707 号



百姓生活记忆

作 者——上海影像工作室

责任编辑——陈翔燕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2 万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296 - 5/G · 77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代序：重拾记忆 重续情怀

李尚智

《上海故事》讲述上海往事。

这些往事之所以能呈现出来，实际上是发掘、整理、研究上海广播电视台收藏的历史影像资料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编导们通过寻访与这些历史影像相关的亲历者、见证人，重温曾经发生在百姓身边的事情，再现这座城市的变迁和人文风情。这些往事涉及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和命运历程。重温影像中的历史，那些已然远逝却又耳熟能详的事件和身影，既让人感觉亲切而有情趣，又激起心中的某种感念和感怀，因为那毕竟是这座城市走过的脚印，是这座城市里的人的故事。

想来应该是它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北京、上海的报刊常常将这部系列纪录片中的一些内容转化成文字再传播；想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林出版社将这部系列纪录片的部分故事编辑成书，呈现给读者。

再一次读到这些故事的文字，我以为它有三个特点可以称道。

披露鲜为人知的史实。岁月风尘湮没陈年旧事，《上海故事》不仅钩沉被淡忘的记忆，而且给观众带来历史氛围的新感知和历史事实的新发现。《城市是轮子滚出来的》披露了一条消息：世界上最早将无轨电车用于商业运营的地方就是上海。德国人于1882年发明了无轨电车，可是直到32年后才被真正投入使用。1914年，上海开通了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从今天的延安东路沿福建路到苏州河边，总长1.1公里。今天的14路无轨电车仍然从这里开过。这条跨越近百年历史的线路为何叫14路？也许是和它开通的1914年有关吧。《文化广场变变变》展现了风靡上海的一系列文化盛事。编导在采访中发现：曾在这里上演的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千人大合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肯定和赞赏，最终成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先导。编导在拍摄上海交

谊舞时还发现：解放前被称作的“交际舞”，为达官贵人所钟爱；解放后改称“交谊舞”，为普通百姓所喜欢。从“交际”到“交谊”这一字之改，原来出自于当年陈毅市长之口。

编导们在采访《上海故事》时，还发掘“抢救”了一批历史影像资料。比如市农委拿出收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崇明围垦的纪录片，上海监狱拿出收藏的解放初期游民生存改造的纪录片。这些影像内容详实饱满，为制作《海上生绿岛》、《烟花女子新生记》提供了大量珍贵而生动的素材。编导在拍摄《记忆中的宣传画》时采访了著名宣传画《毛主席万岁》的作者哈琼文。八十多岁高龄的哈老对往事的记忆已朦朦胧胧，他的女儿帮着一起回忆这幅宣传画的创作经过。编导在采访新中国第一代广告画家丁浩时，他已年过九旬、病重住院，但他还能侃侃而谈当年的创作思路。遗憾的是，节目播出前丁老却溘然去世；欣慰的是，他留下了镜头前的“口述历史”。

折射上海的精神气质。上海这座城市中蕴含着一种人文情怀，传承着一种时代本色。《上海故事》展现出人们心目中向上向善的力量，给观众带来价值取向的新解读。《依好，老师傅》中记录了一位与我国原子弹制造有关的上海师傅，他叫原公浦。原师傅怎么会和原子弹有缘的呢？原来在1964年，二十多岁的六级技工原公浦被国家有关部门选中，调到戈壁滩上的原子弹研制基地参与关键部件铀球的加工工作，这在当时可谓是“惊天伟业”啊！原师傅不顾核辐射对自己的影响，冒着可能引起超临界爆炸的危险，精准地在铀球上车了关键的三刀，大功告成，获得一等奖，“原三刀”的美名由此传开。如果原师傅所车的三刀中哪怕有一刀出问题的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日期就会被推迟。以后，原师傅又参加了包括中国第一颗氢弹在内的十次核试验核心部件的加工工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多少像原公浦那样的工人师傅，“凭真本事吃饭”，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上海的工业技术革新一度成为全国的风向标。《海上生绿岛》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3万干部工人和30万知青在崇明“战天斗地”的故事，片中许多镜头令人震撼。当围垦修筑的堤坝合龙时，遇上风大浪急、草袋土块被水浪卷走，许多“围垦人”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在缺口处筑起人墙，用血肉之躯阻挡汹涌浪潮。共青团员们高喊着：“海龙王你来吧！我是海鸥！我是海鸥！”可谓激情燃烧，气概豪迈。“围垦人”和“农场人”把80万亩滩涂变成了良田，他们不仅为上海开拓了土地资源，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财富。

《上海故事》在回忆往事时还展现了上海人民的博大胸怀和普世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上海先后接纳了从欧洲逃难而来

的2万多名犹太人。他们在虹口区提篮桥一带与10万中国人居住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战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以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大家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犹太难民在上海》中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难民中还有许多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在上海避难期间创作了一批音乐作品。据悉,今年将有以色列犹太后裔音乐家来沪举办音乐会,演奏这些作品,以纪念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难忘的友谊。

体现百姓的美好追求。《上海故事》在记述历史时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主题呈现与现实关怀相映照,以人物观念、命运的变化来见证时代的进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上海女性的服装也日趋丰富起来。《一位劳模的美丽记忆》讲述了纺织女工黄宝妹热爱劳动、热爱美丽,成为时尚偶像的故事。黄宝妹曾8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3次出席国际会议。她从苏联回国后,穿起了深受苏联妇女喜爱的“布拉吉”(俄语中连衣裙的意思),还烫起了头发。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女劳模都穿“布拉吉”了,上海的“布拉吉”热潮一下子就给带动了起来。黄宝妹还多次作为青年代表出访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她和其他中国姑娘在出席联欢会开幕式时,都身穿旗袍入场,外国友人见此起立欢呼:中国“旗袍姑娘”真漂亮!黄宝妹的服饰也代表了当时上海女性对流行时尚的追求。《一代人一套书》讲述的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给数百万知青带来希望、改变命运的故事。“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上海科技出版社立即再版发行了这套《丛书》,为远在外地农村渴望复习迎考的知青们解了燃眉之急。当年安徽的王东风和万曼影、山东的焦扬等知青,都在《丛书》老师的指导下,分别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如今,王东风、万曼影已是交大教授,焦扬已是中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焦扬说,《丛书》老师带着我由浅入深地步入知识的殿堂,帮我们打开一扇窗、一扇门,让我们接触知识、追寻真理。《丛书》唤醒了上海许多青年人的求知欲,全社会掀起了读书热潮。

《上海故事》还将历史记忆和现代感悟相结合,用新观念的呈现去更替往日的迂拙。《海上生绿岛》既记录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动员3万多干部工人去崇明岛围垦造田、种粮种棉的场面,又记录了本世纪初崇明人转变观念,停止围垦,植树造林,保护湿地,发展生态旅游的故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

理念。

历史的声音和影像常常有着神奇的功能,它可以唤醒人们脑海中最深层的记忆和情感。《上海故事》承载着上海这座英雄之城、魅力之城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传递了一种情愫、一种温暖和一种自信,让人重续情怀、重新思考、重塑辉煌。《上海故事》所呈现的城市精神和气质,将有助于凝聚、激励和打造新一代上海人的精神品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后代多保留一些城市的记忆和发展的轨迹,成为我们这辈人的责任。我真心希望《上海故事》节目做得更好更美,让更多的观众喜闻乐见;也真心希望据此而来的《百姓生活记忆》,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思索,觅得更多的知音良友。

(作者系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常务副会长)

目 录

一、文化广场变变变 / 001

文化广场的历史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而文化广场不断变化的历史所折射和见证的是时代的变化、城市的变化、社会的变化

二、记忆里的宣传画 / 013

如果我们把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宣传画按照年代作一个排列的话,这就是一部图像历史了

三、50 年前他们怎样过日子 / 024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风暴来了,把全世界吹得稀里哗啦,而中国之所以能抵御这场金融风暴,就在于中国的老百姓会过日子

四、侬好,老师傅 / 031

因为掌握了车工、钳工、刨工等技术,对一个在工业城市里谋生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他拥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徒弟当然要尊重师傅,这是给他饭碗的人,后来,徒弟对师傅的尊重也成为了上海这座工业城市的市民情怀

五、一本遗失的恋爱日记 / 041

这本恋爱日记塑料封面的夹层里还夹着一张纸,是他们结婚喜糖的清单。上面写着:一共买了 35 斤喜糖,共花了 35 元 5 角钱。每个喜糖袋里放 8 粒喜糖,平均每一袋喜糖的成本是 1 角 4 分 9 厘

六、1980 年代裸婚之鸳鸯楼记 / 053

当年的那一代青年人和新世纪的这一代人相比,他们真的很穷,真的可以说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裸婚真的可以说是当年的一种结婚常态

七、换房的故事 / 062

到了夏天的傍晚,很多上海人搬个凳子在马路两旁闲坐,上海人叫“乘风凉”,总会看见有人拎着浆糊桶,在电线木头上张贴换房子的小广告

八、小菜场里趣闻多 / 074

原南市区老城厢的很多路名是各种小菜的名称,如外咸瓜弄、面筋弄、火腿弄、豆市街,等等

九、弄堂里的乒乓传奇 / 082

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上海的乒乓少年从弄堂的深处走出来,走上了世界乒坛,为国增光

十、海上生绿岛 / 090

这些围垦人来自于全市的各行各业,在1960年的秋天,他们像大海的排浪一样涌向崇明海滩。政府号召,他们响应,国家有难,大家担当,这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也是上海的光荣历史

十一、里弄生产组的女人们 / 101

那个年代,上海制造享誉全国,上海的工业产品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呱呱叫的,然而,很多顶呱呱的上海货就是出自于这些里弄生产组,出自于这些老阿姨之手

十二、里弄生产组的青年人 / 110

1970年代的后期,一列列火车驶入了上海火车站,一群群回沪知青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他们茫然回顾,注视着这座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们似乎看到了远

处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里弄生产组欢迎您

十三、难忘的老电影

/ 118

回忆老电影,真的蛮有趣。电影《追捕》里高仓健扮演的杜丘先生在一段时间内竟成为很多上海女性心目中所爱慕的标准男子汉形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的报纸上一度还兴起了“寻找男子汉”的大讨论

十四、一位劳模的美丽记忆

/ 128

如果上海的女性都能穿得花花绿绿、色彩缤纷,就像蝴蝶在百花园里飞来飞去那样,将是社会主义新上海的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

十五、回望淮国旧

/ 138

很多上海的中老年人对“淮国旧”难以忘怀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淮国旧”虽然卖旧货,但决不卖假货

十六、一套改变命运的丛书

/ 149

大家这样排队究竟买的是什么书呢?不是什么中外名著,而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丛书为什么如此地火爆呢?因为在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

十七、一个中方陪同和一个外国导演的邂逅

/ 161

有些东西我们认为很先进的,他们外国摄影队却没兴趣。我们有关方面的安排就泡了汤,这也是老朱对往事的记忆

十八、犹太难民在上海

/ 169

有一位犹太难民回忆,当年他在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收到了一封美国亲戚发来的电报,电文只有3个字:去上海

一、文化广场变 变 变

文化广场的历史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而文化广场不断变化的历史所折射和见证的是时代的变化、城市的变化、社会的变化

四川的变脸是一门艺术,文化广场的变脸是一部历史。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上海的文化广场又一次变脸。

2005年,原先文化广场里开设的精文花市关门停业了,老旧建筑也被拆除改建。2010年,在文化广场的原址上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地下音乐剧场,周围是一大片的公共绿地。新文化广场将成为新世纪上海的一个新的文化地标。新建筑造好了,老房子消失了,文化广场的历史记忆会不会随风而去?当80后、90后、00后以及更后世的新新人类走进新文化广场的时候,他们对老文化广场的往事知多少呢?在人们的记忆中,文化广场一直在变、变、变,时代变化了,社会变化了,文化广场也会变,跟着变,不断地变脸。



文化广场正门及办公室,现已撤除

汪志星摄影



1969年冬天里的一把火烧毁了文化广场,当年的上海人举头望黑烟,心中多惶恐

冬天里的一场大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曾把文化广场变成了一片废墟。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人们在哼唱这首歌时一般也不会把费翔所唱的这把火和烧毁文化广场的那把火联想到一起,虽然都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1969年的12月19日,上海西南的上空浓烟滚滚,文化广场燃起了熊熊大火。当年的上海人举头望黑烟,心中多惶恐。因为文化广场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那时正是文革年代,文化广场是上海政治风暴的中心,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很多的政治集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一度文化广场还被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那么是不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放火烧文化广场?当时的人们都绷紧了敏感的政治神经。

尽管当年文化广场火灾所升腾的黑烟全上海都看得到,但是关于文化广场火灾的消息在报纸上却一个字也看不到。当时的媒体集体失声,当时的民间还没有微博。

40年后,本文的作者,也就是拍摄文化广场电视片的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当年住在文化广场附近的居民们,他们是那场火灾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救火。

现年 80 岁的姚祖浩老先生，一位中学退休教师，他回忆说：“那天我在家里看见广场那边在冒烟，很多人都来了，学生啊、居民啊都围过来了。开始还不知道舞台下面是战备物资的仓库，后来知道了就帮忙抢救，能够拿的、能够搬得动的就往外面搬。”

朱瑞根老人，71 岁，原上海卷烟厂职工，他说自己差一点葬身火海，“我一看不对了，里面着火了，我本身在厂里就是义务消防员，这个时候，我就冲了进去。后来我只觉得头上被敲了一下，以后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淮海医院了，如果说我头上被敲的不巧的话，我的儿子就变成遗腹子了，那时候我老婆怀孕了。”

在上海档案馆，记者找到了当时瑞金、华山、中山等 8 家医院收治文化广场火灾中伤病员的统计表和名单。为扑灭大火、抢救国家财产而受伤的有 200 多人，其中重伤 30 多人，有 13 位市民不幸英勇牺牲，在牺牲者中，青年和学生占了 90%。由于火灾的消息被封锁了，那些在扑灭大火中光荣献身的烈士也就只有他们的亲人来纪念他们了，更多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70 年重建后的文化广场

胡文宪是13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年仅15岁,生前是上海五四中学的一位中学生。经记者多方寻访,找到了胡文宪的哥哥胡文亚。

现年57岁的胡文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弟弟正好是在学校上课,知道发生了火灾,一起上课的同学就朝文化广场的方向跑过去,当时路口已经封锁了,他就急中生智,爬上救火的卡车,进去以后抢救地下室的国家财产,当时有两个救火的同志晕倒了,他把他们救出来,他自己再冲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说到这里,胡文亚泪眼朦胧。

如今这13位烈士,静静地长眠在上海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

那么,文化广场的那场火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经调查,原来当时文化广场正在进行大修,房修队在维修时违规操作,一名维修工在使用冲灯时,气打过了头,导致火油往外冒,他手烫得拿不住了,就把冲灯扔在了芦苇层的隔层里,火就这样烧了起来。这是一个责任事故,和阶级斗争无关。

1970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重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又开始一次变脸。

看你穷和看他富

文化广场是上海的一个地标,如果你打的去文化广场,的哥肯定不会问在什么路上,而是一踩油门就上路了。

不过,还有极少数的老年人会把那地方说成跑狗场,的哥就会被搞糊涂了。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文化广场的前身,就是跑狗场。近代世界的赌狗业产生于英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行当跑到了东方,来到上海。1928年,一个名叫邵禄的法国商人在法租界的这个地块上开办了逸园跑狗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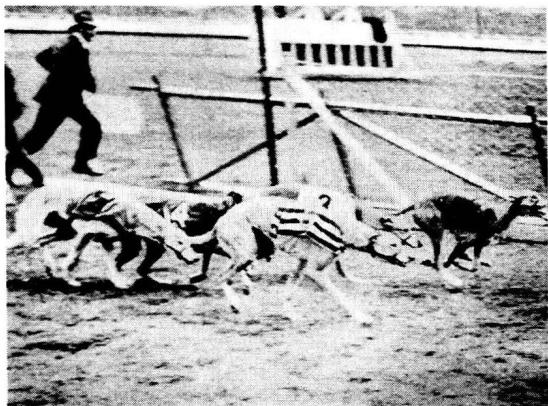
88岁的李明藻老人还记得当年跑狗的情形:“一次跑八条狗。八条狗领到赛场,有一个电的兔子,电钮一按,八扇门弹起来,八条狗全部冲出来追着电兔车。电兔车不会被狗追上的,因为电力会把速度控制着。跑到最后,哪条狗在前面,买了这条狗奖票的人就发财了。”

今年80岁的姚祖浩老人还记得小时候看到跑狗场的门口满地全是废票,“第二天早上去,门口地上有许多废票,买到票中奖了,就可以凭这张狗票领奖。如果买的狗票没中奖就变废票了,到处都是满地乱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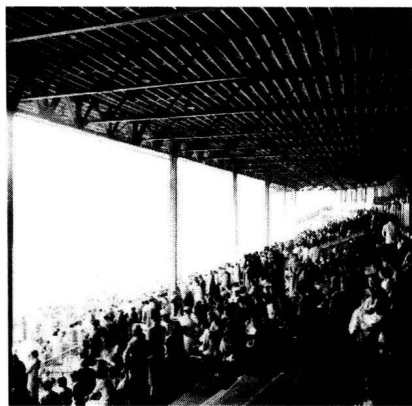
逸园跑狗场的英文名称是Canidrome,它的中文谐音是“看你穷”。的确,当时因跑狗赌博而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而对跑狗场的老板而言,那就是“看他富”了,仅在1938年,这个跑狗场的账面利润就达到360万银圆。

在那个历史年代里,人们习惯把逸园叫成跑狗场,以致后来很多人都以为逸园

只是跑狗。其实不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租界收回,上海的赌狗业也被禁了,逸园也开始了变脸。



逸园跑狗场



逸园跑狗场看台

1946年的春节里,驻沪美国海军别出心裁地举办过一次黄包车皇后大赛,也就是让每一辆黄包车上坐一个美女,看哪个黄包车车夫跑第一,这辆车上的美女就被封为黄包车皇后,这次比赛的起点设在外滩海关大楼,终点就在逸园。比赛当天人山人海,逸园看台上更是坐满了看热闹的中外观众。第一个跑到逸园的黄包车夫是个崇明人,他被戴上了象征冠军的花环,而金光闪闪的奖杯则给了车上的美女。

那年代,逸园虽然不跑狗了,但名堂还多着呢,那里设有旅馆、餐饮、舞厅、球场、露天电影院等,是当时上海滩上很有人气的休闲娱乐场所。

曾经取名人民文化广场

解放以后,逸园变脸,成了文化广场。

2010年10月的一天,记者前往上海华东医院去采访86岁高龄的文化老人黄宗英,这次采访是有备而来的,先用笔记本电脑给黄宗英播放了一段60年前的新闻影片。影片反映的是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逸园举行,影片中有黄宗英在大会上发言的镜头,当时年轻漂亮的黄宗英代表文艺界在大会发言。这段影片勾起她的回忆,她很激动,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会,第一次作为代表发言,旧社会我没有开过会,开会两字对我很陌生。所以那时候,从逸园开完会回来,赵丹说,你们开会小组讨论,讨论些什么?我说我闹不清楚,他们老说台阶台阶。他说什么台阶,是说阶级吧?我说对对对对,是说阶级。说阶级

我也听不懂,什么事都觉得很新鲜。”黄宗英还回忆说,“当时他们在会上还把所有的钱都买了折实公债,大伙都是很热情的,对新社会充满了希望。”

黄宗英把阶级听成了台阶,想想也对,阶级这个词的本义也许就是台阶。看来,还是赵丹的政治意识更强一些。

由于逸园场地大,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很多群众性的政治集会放在了逸园召开。连从来也没开过会的黄宗英也要开会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通过多集会,开大会,把人聚拢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发动和引领上海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52年4月,经陈毅市长的批准,将原来是露天的逸园跑狗场改造成能遮风挡雨的大型室内会场。当时取名为“人民文化广场”。同年11月正式命名为“文化广场”。

竣工后的文化广场能容纳1.5万人,新建1000多平方米全上海最大的舞台,因为要支撑起上海最大的屋顶,所以在会场里有不少的柱子,坐在柱子后面的人开会无大碍,只要耳朵听就行了,看演出就有点麻烦了,一柱障目。会场里全是长条凳子,当年没有空调,夏天为了通风的需要,场馆的两边是镂空的,到了冬天,场馆的两边搭起了芦席棚来遮挡寒风。1969年的冬天,就是因为房修队的工人由于操作不慎,点燃了芦席这种易燃物,酿成了大火灾。

尽管在文化广场的正式名称中,原有的“人民”两字被省略了,但是它的群众属性却明明白白的,当时上海的人口总数600多万,而文化广场每次开会或演出,全上海差不多每400人中就会有一人来到文化广场。

当年的上海人走进文化广场,不仅是开大会,有时也来看演出。当年的文化广场有上海最大的舞台,也是可容纳观众最多的剧场,像前苏联的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中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都来到文化广场演出过。

关于文化广场的文艺演出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海“大歌舞”,北京“东方红”

1964年的6、7月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两次来到文化广场,看的却是同一台文艺演出,为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5月,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隆重开幕,这届“上海之春”推出了一台由300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也称“大歌舞”。演出很精彩,尽管文化广场内柱子很多,坐在柱子背后或场子后排的观众会看不见或看不清舞台上的演出,但人们还是如潮水般地涌入文化广场。

曾担任大歌舞节目主持人的王秉钺回忆说,当年的演出反响非常之好,后来又加演了7场,场场满座,一票难求。

上海歌剧院的歌唱演员任桂珍也参加了演出,她回忆说:“我当时正怀孕8个月。很奇怪,在文化广场演出的时候,气息特别足,恐怕我的女儿在帮我一块儿唱吧,大家还觉得比平常的声音都要好呢!”

1964年6月16日,陈毅副总理陪同正在上海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在文化广场观看了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当年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孟波同志陪同观看演出。如今已有95岁高龄的孟波老人回忆说,“当时中央也在考虑建国十五周年搞节目的事,陈毅副总理看过后说,这个节目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一定得请周总理亲自来看过之后才能够定。”

1964年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一起,观看了这台大歌舞。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陈毅连夜召集上海文化局孟波等领导开会,酝酿如何赶在国庆之际,在北京也上演一部类似的大型歌舞作品,要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会上,周总理首先肯定了上海的这台节目,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础,陈毅副总理提出请周总理来当这个节目的总导演,于是这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孟波老人的回忆。

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把北京文化部系统和总政系统的文艺工作者集结起来,再加上上海的一些音乐歌舞工作者一起,编排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成功,成为新中国的经典之作。

后来出版的《党的文献》月刊上,披露了1965年1月8日,周总理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的讲话。周总理说,“(东方红)大歌舞的上演比较仓促。它是受了朝鲜的大歌舞的影响,在上海的大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饮水要思源,不能忘记朝鲜、上海的大歌舞是先导。”

如今说起这段往事,说起当年上海的这种文化原创力,让人很感慨。

为了让每个观众都能看到舞台上的毛主席像

1969年12月冬天里的一把火把文化广场烧毁了,1970年的10月,新文化广场建成了。当年的上海人都说,文化广场变样了。最大的变化,是重建的文化广场不用1根落地立柱,照样擎起了5000多平方米上海最大的屋顶。来到文化广场看演出,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座位会不会令人遗憾地躲在柱子的后面。

当年参与重建工程的同济大学教授胡学仁和原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姜国渔回忆说,文化广场被烧毁后,大家都希望能重新设计建造一座独特的、